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

用马克思主义视角诠释中国经济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学慧 熊 丽

当代知识分子风采

人物小传

刘元春，四川大竹人，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2016年11月起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他是“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特聘专家、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家新世纪人才。同时，他还兼任国家高端智库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主要从事开放宏观经济学、世界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

在刘元春看来，经济学界要对中国宏观经济学有所贡献，必须充分吸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养分；必须要能够解释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最终必须要对中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提供建设性的思路，这是判断理论的最根本标准。

“实事求是”，镌刻在中国人民大学东门巨石上的四个大字，也刻入了刘元春的精神基因。

自1989年踏入人大校门起，近30年的时间里，刘元春的学术之路几经波折——学生时代从计划经济学转向政治经济学，初执教鞭时被分到国际经济学方向，最终深耕开放宏观经济学。从普通教师、经济学院副院长、科研处处长到副校长，刘元春的角色在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求索之心，从未改变。

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是历史赋予这一代学者的光荣使命。刘元春学术生涯泛起的波澜，折射出的正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经历的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也呼唤活跃在经济研究舞台上的中青年学者，在理论创造和学术繁荣上有更大作为。

近日，记者走进刘元春位于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的办公室，满室书香中，聆听刘元春的故事。

人生小波折成就学术大视野

“说起来，我现在的很多人生道路，在高中时就想得比较清楚了。”刘元春说。

1972年8月份，刘元春出生在四川大竹的一个乡村教师家庭。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全国，西部小城大竹也不例外，当时正在大竹中学念书的刘元春逐渐接触到一些经济学知识。尤其是1988年，中央决定放开管制，取消物价双轨制，“物价闯关”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变化，令刘元春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次年填报高考志愿时，17岁的刘元春选择报考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类专业，并被计划统计学院录取。

计统学院的建立源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由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国家物价总局与人大联合设立的，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学专家和管理人才。1984年，陈云同志还为计统学院题写了院名。“在计划经济时代，可以说是中国教授计划经济的大本营。”刘元春说。

校园里的紫藤花开了又谢，埋头苦读的本科4年转瞬而过。1992年大学毕业时，刘元春再次面临选择。

1992年春，88岁的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同年10月份，党的十四大正式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变革，对于经济学专业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刻的。“我们毕业时面临着很大的冲击。我所在的这个专业，价格学在1992年被取消。”刘元春回忆说。未来应何去何从？出于对经济学的挚爱，刘元春选择了继续在人民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师从林岗教授，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如何认识市场经济方面下了很多功夫。

“原来我喜欢做一些纯思辨性的研究，读硕士研究生后，开始把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作为主攻方向，从历史和制度的维度来探究经济制度发展演变的过程。”刘元春撰写的硕士论文《诺斯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动力的比较》，在《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等多个权威杂志上发表。他的博士论文则以《动态宏观视野下的交易费用分析框架》为题，对当时的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作了批判性研究，并在2001年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

深厚扎实的理论研究功底，令刘元春成为同辈翘楚。1999年博士毕业时，他留在了人大经济学院任教。“博士留校时，我父亲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像我们这样从农村出来的，很多人都觉得应该去当公务员。”尽管留校时工资不高，但刘元春依然坚定了自己的选择，“人嘛，总有自己的一些基本价值判断”。

然而，刘元春并未如愿延续政治经济学的方向，而是阴差阳错地被安排在国际经济学教研室，从事国际金融、世界经济方面的教研工作，跨度可谓非常大。从2004年起，刘元春将开放宏观经济学作为自己研究的主要领域，把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实证性分析和理论性框架的构建作为学术研究的核心。

每一段经历都是历练，每一程风雨都有收获。2006年，刘元春主导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正式推出，论坛围绕中国特色求真求实，将人大的学科优势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有机结合起来，经过1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人大重要的学术品牌。

“学术方向的小波折，反而成就了我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和独特的研究视角。”刘元春说。

为政治经济学贡献力量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对此，刘元春倍感鼓舞。

“目前经济学界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且已经作了很多划时代的创新。但是，如何更好地与传统相对接、与理论范式相融合，理论界要进一步有所作为。”刘元春说。

早在2005年，刘元春就在《开放宏观经济分析与中国案例研究》一书的序言中指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在世界经济体系的崛起，要求中国经济学界必须建立能够体现中国国情和现代经济学发展成果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以对中国未来宏观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作出系统的回答。

刘元春告诉记者，所谓开放宏观经济学，强调从历史、制度和开放的维度来分析宏观经济。他进一步解释说，一是历史的维度，主张从中长期来看短期，从历史的大时段来把握短期的周期变化和经济运行。二是制度的维度，也就是政治经济的维度，更强调制度在决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在决定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中的作用。如果没有从根本上认识清楚中国政治社会运行的深层次规律的话，要想把握宏观经济的变化过程就很困难。三是开放的维度。中国处在全球化环境和市场经济的运行体系中，不了解世界，不足以了解中国；不了解世界经济大周期的运行模式，难以知道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

“在这些维度中，都蕴含着对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的认识。我们预测中国宏观经济的未来走向，在很大程度上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而不是简单地按照西方经济学。”刘元春说。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例，要跳出西方经济学的桎梏，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综合性集成创新，是中国经济和中国模式在新时期的一次探索性改革和调整，其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必须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适应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使命，能够提供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的科学答案。

在刘元春看来，经济学界要对中国宏观经济学有所贡献，必须充分吸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养分。现在很多年轻人研究中国经济喜欢简单套用凯恩斯主义或新古典方法，这些理论虽然也对市场经济作出了很好的反思和总结，但如果简单地套用到中国，还是有很大问题。“不管主张哪一种观点，从哪一种视角，必须要能够解释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最终必须要对中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提供建设性的思路。这是判断理论的最根本标准。”刘元春说。

让经济理论在学生心中扎根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许多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经济学界也开始反思经济学理论。2011年，著名经济学家曼昆遭遇哈佛大学本科生罢课。在罢课学生的公开信中，他们不无忧虑地表示，“如果哈佛不能使学生们具备关于经济学之更广博与更具批判性的思考，他们的行为将会危及全球金融体系。近5年来的经济乱象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无独有偶，早在2008年，英国女王访问伦敦经济学院时，就向学者们提出了“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信贷紧缩”的问题。

提及这两件事，刘元春深有感触，“这个时代对原来的教材和学科分类有很大冲击，特别是对精英阶层的传统思维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他认为，大危机面临大挑战、带来大改革，在这样的结构大调整期和制度大变革期，必须创新思维和理论。尤其是像人大这样的一流大学，经济学教学必须要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否则不可能培养出超一流的学生。

在采访中，刘元春多次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他认为，要让学生能够感受到经济学的逻辑之美和力量之美。“很多西方经济学理论走入了逻辑之美的陷阱，却忘了解释力和建设力。如果所学回答不了当前的问题，学生凭什么要学？”

“原来我们有很多学生陷入这样的困局：学了半天，提的是假问题，研究的是假主义。写了很多论文，但是对现实一窍不通。”刘元春直言，“理论上的偏执狂，现实中的幼稚症”，是教育的失败。

现在，刘元春依然给本科生上大课，讲授开放经济学。他说，经济学教学不是简单抽象的教条和公式推演，应该匹配大量国内外经典案例。只有将抽象的原理融入到经典案例中，学生才能真切地体会到理论的合理边界，从根本上激发学生的理论自信。要让学生认识到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效的，我们所提供解释的理论框架也是有效的，也认识到下一步中国发展还面临着很多理论和现实问题。

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对教师和教材提出了很高要求，这也是人大持续努力的方向。刘元春说，“我们在课堂里要把浓缩的世界教给学生，要让理论入脑入心，在年轻人心中扎下根来，使他们感受到理论的魅力”。

特色智库要有现实导向

2013年6月份，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正式成立，成为人民大学整合学校优质智库资源重点打造的新型高端智库，在经济治理与经济发展、政治治理与法治建设、社会治理与社会创新等研究领域搭建了重要平台。2015年12月份，国发院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今年3月11日，国发院的英文网站正式上线，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从国发院成立至今，刘元春一直是执行院长，在智库建设上投入大量精力。他本人也常规性出席国家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其中包括3次总理经济专家座谈会，并被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国家货币政策委员会、发改委、财政部等多个部门聘请为专家，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刘元春认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须要有现实导向、战略导向和问题导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所提出的民族复兴大业已到关键节点，这也对国家高端智库提出了要求。真正的高端智库，首先要扎根于实践，与时俱进生产出具有思想力和创造力的产品。另一方面，要提高传播力，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体系。

在这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作为新中国建立以来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大学，人大一直与党和国家同命运共呼吸。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完善的学科布局，使人大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拥有重要影响力。“更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关注中国改革的进程，实践导向是很明确的。”

“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把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构建起来。”刘元春说，今年是资本论发表150周年以及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2018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也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国发院将围绕这些主题深入研究。

2016年11月份，刘元春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分管科研等工作。谈及2017年的小目标，刘元春说，首先是要做好角色转换，从专家定位向管理者转变，“虽然多写一些有自己产权明晰的研究当然很好，但是用自己的力量把学校办好，把学科构建好，也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刘元春笑道。

正能量

景爱琴：巧手剪出大事业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提起甘肃定西剪纸，“80后”的农家女景爱琴有着说不完的话题。这不，对着她的心血之作、剪纸版的《清明上河图》，她满是自豪地介绍起来：“这幅《清明上河图》有人用机器做，一天能做100多套，我用手工剪，花了整整一年。但我觉得，纯手工应该是剪纸的魅力所在。”

从小时候玩剪纸，到经营剪纸，再到把剪纸工艺送出国门，这位陇中黄土地上的农家丫头，凭着一股韧劲与执着，硬是将普通的农家剪纸剪出了名气，剪成了事业。

作为家中幼女，景爱琴从小被惯着宠着，但却很有主见。10多岁时，她就把自己的剪纸拿到市上的画廊里代销。20多岁时，景爱琴决定自己开个剪纸店。没想到，家里人都炸了锅：女娃娃家剪着玩就算了，这哪是个营生？看着女儿愁眉苦脸，母亲心软了，她支持女儿开了店。

“开店前3个月，我加班加点剪了20多幅作品放到店里，没想到一开张根本没生意。”不服输的景爱琴白天开剪纸店，晚上摆地摊卖生活零用品挣钱。她清楚地记得卖出去的第一幅剪纸作品是《二十四孝图》，挣了600块钱。“半年后，每个月能卖出去两三幅作品。钱不多，但生活费有着落了。”

后来生意越来越好，景爱琴注册了公司，办起了剪纸合作社，带动周边农村的60多名妇女做剪纸。活儿做得多的妇女，一年能挣2万多元，平均下来每人一年有3000多元的收入。

挣钱是次要的，在景爱琴心里，一幅幅剪纸作品更是文化。“非物质文化既要传承，也要通过市场推广，让传统技艺真正活起来。”2015年，景爱琴作为中国文化界的妇女代表，参加了在南非举办的“南非中国年”中南妇女文化交流活动；2016年，景爱琴又作为非遗传承人代表，参加在埃及开罗举办的“甘肃文化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

不过，景爱琴也有她的困惑，特别是传统手工剪纸如何应对工业化剪纸的冲击。手工剪纸不仅时间成本高，用料成本也高，仅手工纸张的成本就是机器生产用纸的10倍左右。

剪纸是传统艺术的重要载体，内容创新才是关键，这也是应对机器冲击的关键。为此，景爱琴加大了原创设计的力度。在景爱琴的店里，不少剪纸动漫、人物脸谱等新潮作品比比皆是。“我们还在探索剪纸创意产品，把剪纸与茶具、厨具、土特产品等融为一体，扩大剪纸的影响。”景爱琴说。

上图 景爱琴在创作。 本报记者 李琛奇摄

印象

“无臂硬汉”赵丙辉

16岁时，河北深州市西蒲疃村村民赵丙辉不慎被高压电击中，虽然保住了性命，却失去了双臂。面对命运磨难，他凭着坚强的意志，克服了如山的困难，走上了自强之路。40多年来，他创办的企业规模越来越大，还为乡亲们提供了10多个就业岗位。随着网络兴起，他又学会了用双脚操作电脑，利用电脑了解市场行情、联系客户。回望来路，赵丙辉动情地说：“失去双臂是我的不幸，但我得到了社会方方面面的温暖。我想用实际行动激励更多身残志坚的人，自强自立，回馈社会。” 杜柏桦摄影报道

赵丙辉在自家桃园忙生产。

赵丙辉“动肩”加工板材。

一席谈

用有效有质的增长缓解风险

刘元春

2017年，底部运行将是中国经济形势的基本特征，经济增长摆脱过去持续下滑的状态，但是还没有迎来全面反弹。整体来看，今年可能会呈现出前高后低的增长态势，随着外部环境的好转和内在动力的成长，明年摆脱目前的底部运行状态是可以期望的，并且有可能出现好于预期的增长态势。

目前我们的经济运行总体还是比较平稳的。从风险来看，主要的风险点还是在债务方面，只要能够把控好企业债务、房地产泡沫和汇率等几个问题，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明年经济出现明显复苏问题不大。

这是因为，首先，欧美经济已经出现了明显变化。实际上美国经济在2015年已经摆脱低迷状态，今年欧洲也开始好转。世界经济景气明年可能传递到中国。其次，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召开后，社会各阶层经济建设的积极性明显提高，改革的动力全面高涨。今年又是十九大的召开之年，政治生态净化、政治局面稳定所带来的政治性红利是非常明显的，将助推各级政府作出实质性调整。此外，居民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服务业稳定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

在这两种主导力量的全面助推下，新旧动能的转化将会进一步加速，传统风险点会得到较好的缓释。通过有效有质的增长来缓解目前的风险，是最佳的模式，而不是简单地硬性调整债务。

行进中国 精彩故事 每个故事都是时代印记

本版编辑 胡文鹏 徐 达